

群体极化、二阶多样性与制度安排

——读桑斯坦《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

程 岩

内容提要：群体极化是一种持有相同倾向的人在群体讨论结束之后，更趋向保持原有观点且变得更为极端的社会现象。群体极化形成于社会隔离机制与群体的自我确信和确认。促成群体极化的社会心理学诱因源于新的信息交流，而荣誉感、舌战优势、抱有偏见的辩论、退出机制、社会压力、权威结构、具体境遇、群体思维等促使群体极化的进一步发展。群体极化遍布社会政治领域，它们绝非无理性的冲动，而是在社会隔离机制的诱发下理性的自我选择与自我强化。因此，防止群体极化就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压制办法，而是循着群体极化得以产生的制度机理入手，通过导入群体内的一阶多样性和群体之间的二阶多样性，形成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开放社会辩论空间和强化自由信息交换机制，形成有效的制约与平衡制度，防止群体极化向极端主义的有害化发展，而不是单纯地依循传统或体验、评估特定后果，简单粗暴地铲除群体极化。

关键词：群体极化 极端主义 群体思维 社会串联 二阶多样性

程岩，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后。

法西斯主义为什么在 20 世纪 30 年代崛起？学生激进运动为什么会在 20 世纪 60 年代在全世界范围内爆发？恐怖主义为什么在 20 世纪 90 年代在全世界蔓延？卢旺达大屠杀为什么会发生？前南斯拉夫和伊拉克为什么会发生大规模的种族冲突？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监狱的美国大兵们为什么会实施酷刑、羞辱犯人？为什么很多人倾向于认为，是以色列或美国为了给出兵攻打伊拉克或占领阿富汗提供口实而不惜自编自导“9.11”恐怖袭击这样的悲剧？为什么种种阴谋论遍布于形形色色的人中间，并且人们不仅深信不疑，而且会将其当作是对一切信息真伪判断的终极标准？

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各不相同的，对这些问题彼此之间是否有所关联的回应也是建立在碎片化的知识进路之中。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桑斯坦教授看来，在这些初看上去毫无关联的行动者所采取的趋向于极端化的行动背后，都有着一个重要的一致性的现象：许多时候，一群人最终考虑和做的事情是群体成员在单独的情况下本来绝对不会考

虑和做的。^[1]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当人们身处由持有相同观点的人组成的群体当中时,他们尤其可能会走极端。当这种群体中出现指挥群体成员做什么、让群体成员承担某些社会角色的权威人士时,很坏的事情就可能发生”^[2]呢?

正是为了对上述问题做出系统有效的理论回应,桑斯坦于2009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一书,该书简快明要地提炼出现代社会生活中各种看似丝毫无来由地生成、发展、壮大了的极端主义出现的社会心理机制以及隐蔽在这些社会心理机制背后的组织、制度机制,在此基础上,桑斯坦进一步总结了这些形态各异的极端主义所可能造成的对于安全、和平、经济发展以及各种领域中理性的决策所可能构成的威胁,以及从总体上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规制措施来有效应对这些极端主义。

一 何谓群体极化?

什么是群体极化?在桑斯坦看来,群体极化指的是“进行讨论的一个群体的成员通常到最后所采取的立场,与讨论前成员所持有的倾向总体相同,而且更为极端”。^[3]群体极化并不局限于具体国家、特定时期或者是某种文化,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例如,有种族偏见的白种人在彼此交谈之后会显示出更严重的种族偏见;女权主义者在彼此交谈之后会更为强有力地对其观点深信不疑;热衷于房产投资的人一旦认为投资房产是上上策,在彼此讨论之后,他们投资房地产的热情就会高涨。类似现象,不胜枚举。如果说上述具体事例中有一个规律的话,那么就是具有相同看法的人们都倾向于走向开始交谈以前所持看法更为极端的版本。循此规律,由具有反叛甚至暴力倾向的人组成的与其他社会群体隔离的、孤立的小群体,会因为它们的自我隔离而更加急剧地走向暴力方向。同样,政治极端主义者也会在群体极化的助推之下趋向更为极端的立场。

群体极化遍布于社会生活、政治、经济行动中的诸多领域。它涉及我们的经济决策、我们对邻居的评估、甚至是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和在哪里居住等问题上的具体决策。进一步地,它还涉及我们对特定社会政治问题的看法。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在涉及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残疾人歧视、照顾弱势群体的“积极行动”、竞选资金、环境保护、劳工保护和言论自由、州际贸易等宪法问题上,同样存在着群体极化的趋势。总体来看,群体极化起源于社会隔离机制的隐蔽支配。由于社会隔离的存在,群体成员和非群体成员之间所存在的怀疑意识就会在肉体或心理上得到实现。社会隔离使得群体外的人们信息和观点受到群体内的人们的普遍质疑,这样,在群体内部交谈的过程中,就不会存在任何打扰群体内部成员趋于极化的过程。在社会隔离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下,群体极化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进一步的极端主义。群体极化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在经由群体内部成员们的充分讨论之后,最终所形成的意见都会比之前成员们所秉持的意见更为极端,他们所采纳的立场也较之前单个成员所采纳的立场来的更为极端。这种情形不仅在桑斯坦所主持的包括有关

[1] [美] 凯斯·R. 桑斯坦:《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尹弘毅、郭彬彬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2] 同上注,第3页。

[3] 同上注,第4页。

全球变暖的国际条约签订、关于同性恋婚姻的不同群体视点以及针对弱势群体的“积极行动”的有关看法的社会实证调查项目^{〔4〕}中有所体现,它还体现在美国联邦法官们在一些意识形态争论极大、立场鲜明的宪法裁决中,例如在堕胎、国家安全以及死刑案件中,秉持原有特定意识形态立场的法官,在内部讨论之后,往往不会受到其他意识形态立场的法官们的影响,会更进一步地阐述其观点,使其观点比合议之前更为极端。

第二,内部多样性的减少。由于内部讨论乃是一种公开的方式来驱逐异质的声音和意见,群体极化还表现为内部同质性的进一步增加和多样性的急剧减少。群体成员更愿意与整体保持一致而不是将自己原来秉持的异见进一步地保持下去。他们更愿意强调共识的合理性和绝对支配地位而不是去强调多元的意见和声音。他们会认为内部的分歧和异议是不忠诚的表现,因此,内部多样性的减少往往伴随着内部抱团、互表忠诚。^{〔5〕}

第三,不同群体之间的分歧的进一步加剧。秉持固有立场的群体在社会隔离机制起作用的领域的内部自我对话,最后会使得他们更愿意将自己的极端立场作为自己的标签,并用此标签作为自己的身份识别符号,他们不介意自己与其他群体的分歧和差异。相反,他们会进一步强调自己所属群体在特定观念和意识上与其它群体之间的分歧,他们强调、放大这种差异,强调自己与别人的差异的显著程度。如此,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似性不复存在,而它们之间的差异会被进一步放大,直至彼此之间出现深度分裂,完全缺乏可沟通性。

二 群体极化的形成机制

为什么志趣相同的人们会走极端?他们在什么时候这样做?群体极化之所以大规模出现并最终趋向极端主义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新的信息交流的出现。群体极化之所以发生,往往是由于人们彼此把自己所知道的告诉对方,而他们所知道的却在一个可以预测的方向上呈偏斜状态。当他们倾听彼此的意见时,他们就采取行动。某种形式的“环境部落习性”^{〔6〕}是现代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境中,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筛选与自己所持观点相同的观点,作为对这样一个背景的进一步延伸反映,人们往往不去趋向于接触与自己相反的观点。桑斯坦在之前的研究中就已经指出,如果信息的流动是在群体成员中以被人有目的地筛选的方式来加以流动,换言之,如果面向特定群体的信息流动是以定制化的方式来加以引导的话,那么,群体极化的发生也就不可避免。从上述信息流动的机制分析,大体可以看出促使群体极化的两个主要诱因:第一,社会对行为的影响,尤其是指人们渴望维护其名誉及自我感觉。第二,群体本身所固有的“观点库”的有限性,以及这些有限的观点库引导其群体成员的方向。^{〔7〕}但实际问题要比这复杂的多。在桑斯坦书中所展示的后续研究看来,群体极化之所以产生并最终必然走向极端主义,主要是由以下几个重要诱发机制所引致的。

(一) 封闭的社交网络

“缺乏信心且不确信自己应当持何种观点的人们,倾向于使自己的观点变得温和。”^{〔8〕}

〔4〕 同上注,第6-7页。

〔5〕 同上注,第38页。

〔6〕 [美] 凯斯·R. 桑斯坦:《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第29页。

〔7〕 [美] 凯斯·R. 桑斯坦:《设计民主:论宪法的作用》,金朝武、刘会春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8〕 [美] 凯斯·R. 桑斯坦:《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第30页。

但如果还有别人也持有这种观点,那么人们的信心就会因此发生变化,他们会因此变得信心爆棚,会倾向于认为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在这个过程中,封闭的社交网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封闭了外面的别样信息,让它们认同的信息在群体内的成员之间叠加,进一步推动群体成员对这些信息的信心和信任,将这些信息和信心所组成的信息回环空间升级为“回音室”,在此基础上推动群体极化的形成并最终助推极端主义的出现。这种封闭的社交网络和信息的相互叠加效应,成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中胜出的一个重要砝码;^[9]也是恐怖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大面积兴起的一个重要的推手:在这种网络中,志趣相投的人交流不满情绪,推动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联袂产生。同样的道理,它也是风险的社会放大得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食品恐慌和核危机恐慌中,我们会发现隐蔽在恐慌背后的封闭社交网络;它是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在科威特人和美国人之间流行的两种阴谋论得以产生的一个诱因:93%的强调爱国主义的美国人认为世界贸易中心大楼毁于恐怖分子袭击,而89%的科威特人认为这是美国人嫁祸伊斯兰世界的阴谋行径。^[10]

(二) 声誉串联

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更希望得到群体其他成员的好感,以及由此获得的自己对自己的好感。有时,我们的观点或多或少地起到自我展示的作用。当然,一些人要比别人更关心自我展示。但是一旦我们听到别人的看法,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就会起码稍稍地朝着占主导地位的立场调整自己的观点。我们有可能克制与我们相左的意见,而对于多数派的观点,我们有可能比我们的实际看法表达更多一些的热情支持。^[11]但要注意,这只是一般情形,是一般情形的普遍假定。由于封闭的群体内部通常存在着轻视地位低下的成员并倾向于高估位高权重的成员的绩效,因此,这些地位低下者在摸清了群体的基本取向之后,通常不会强调自己所持有的信息,更不会把这些信息拿出来公示于众。他们会倾向于迅捷地放弃自己独有的信息,因为对群体内位高权重者所持有的观点以及其他群体成员已经了然了的信息的穷追不舍将会带来群体反对的风险:群体成员更倾向于认为位高权重者所提供的信息或所持有的观点对于群体自身具有价值,并且这种评估通常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12]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群体内部,对共有信息加以讨论的人们在别人看来显得更能胜任某项工作进而获得好处。更进一步地,如果某人把你已经知道的某件事情告诉你,你可能会因此而对此人的好感稍有增加;如果某人把你已经知道的某件事情告诉你,你很可能因此而自我感觉稍稍改善!^[13]这种对自己已经知晓了的信息的再一次知晓背后的双重好感,会成为群体成员强化自己之前的信念、观点、意见的重要推动力量。总体来说,“追求名誉的十分强烈的压力势必造成极端主义、自信和单纯一种观点的状况”。^[14]也正因为声誉串联的诱致性作用,只要人们对其在群体内部的声誉存在着某种担忧,那么,他们会倾向于按照群体内叠加了的信息来强化自己的观点,使其变得更为极端;他们会服从群体内部的权威命令,并自觉地将这一命令执行得比命令发布者所预期的要更为彻底。明乎

[9] 同上注,第32页。

[10] 同上注,第32-33页。

[11] 同上注,第34页。

[12] 同上注,第36-37页。

[13] 同上注,第37页。

[14] 同上注,第38页。

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汉娜·阿伦特所谓的“平庸的邪恶者”^[15]的这一睿见了,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二战时期最终向犹太人举起屠刀、设计各种灭绝犹太人方法的,绝大多数都是德国的平民;也就不难理解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中,大屠杀的参与者们绝大多数都是平民,并且他们的手段远比军人要来得残忍的多。^[16]

(三) 舌战优势和抱有偏见的辩论

从长远来看,封闭的社交网络与声誉串联联手,最后一定会导致群体极化的出现,但就具体情景来说,未必如此。毕竟,从一开始,群体内部存在着不止一个声音,也不是一种意见或观点天然地占据着垄断地位,存在着众多意见是群体结合的初始状况,而这些多元意见的分量有可能是相上下的。在这样的群体中,那些更具有舌战优势的观点最后往往会取得上风,它们会引导整个群体成员的观点倾斜方向,会成为群体成员在对自己观点不那么确信时毅然决然放弃自己的不那么自信的观点的主要诱因。但舌战优势并非天然形成,它来源于群体内部占据主导地位的具体的行为规范。这些规范或隐或显,它们可以体现为某个成员的信心十足并且富有辩论逻辑地引导其他成员的观念趋同。但毫无疑问,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偏见判断和偏见辩论的基础之上。例如,基督教世界尤其是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普遍误解,这种误解经由媒体选择性报道的塑造之后会进一步强化,最后成为美国人面对伊斯兰世界的群体态度,^[17]支持低负税是中低层社会大众的首选,因此,有关负税水平的辩论最后往往倾向于把降低负税水平作为最有效的舌战优势。^[18]

(四) 群体内部组织机制

但群体极化并非简单地由上述几个因素推动形成。上述要素必须在群体内部进一步发酵,并且借助群体内部的组织机制安排才能进一步地推动群体极化的形成。

第一,群体内的极端立场者会对整个群体极化产生重要的助推作用。在一个群体内部意见、观点均较温和,且人们对其所持有的信心并不是很艰巨的情况下,如果有信心的人在群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那么最后群体就有可能发生极大的转变。^[19]

第二,进一步地,如果群体成员具有强烈的自我认同,认为他们分享了共同特征和高度的团结一致,那么,群体极化就会进一步加重。这是因为自我认同往往会压制不同意见:如果单个成员认为其他人友好、讨人喜欢且与自己相似点多,那么,他就会更愿意在彼此之间传递相同论点,不同论点的数量就会减少。进一步,当群体内部认为存在着某种异样的外部群体时,他们的身份认同会进一步强化,群体内部的声音更容易凝结为一个共同的声音。^[20]

第三,如果一个群体允许温和派成员享有充分的退出机会,那么,这个群体就会变得更极端。当然,这种退出机制对群体极化的推动作用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基础上:群体内部

[15] [美] 汉娜·阿伦特等著,孙传钊编:《〈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6] 对此,一名参与了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的杀人者做了一个注解:“如果事实证明你在使用大砍刀方面太嫩,你就可能失去奖赏,目的就是推动你走向正确的方向。如果你有一天受到嘲笑,你很快就会改过自新。如果你两手空空地回到家,就连你的老婆和孩子也会责怪你。”桑斯坦:《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第39页。

[17] [美] 爱德华·萨义德:《报道伊斯兰: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观看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阎纪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18] 桑斯坦:《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第50页。

[19] 同上注,第52页。

[20] 同上注,第54-55页。

不愿意听到不同的声音,它往往视不同声音为不忠诚、背叛、颠覆的象征。在这个前提条件下,温和成员的退出会进一步强化留下来的成员的自我认同,他们会更加志同道合,意见趋向也会更为极端。因为没有异议来中和这些偏向极端的讨论机制。^[21]

第四,与第一点紧密相关的是,如果群体内的成员呈现出明显的“抱有偏见的同化”,也就是说,如果成员们事前被群体规训为“忠实信徒”或“狂热分子”,^[22]他们在阅读一些材料,发现一些论点的时候,往往对那些与自己不同的观点不屑一顾,视之为愚蠢的观点,却会认为与自己相同的观点极其明智,而且十分相关。在一般情况下,群体内部往往愿意降低内部认知上的不和谐,他们希望寻求与自己的观点相一致的信息,倾向于否定和回避与自己观点相左的信息。^[23]这种抱有偏见的同化往往导源于事先的坚定信念和对立双方信念的分歧,它的信息搜寻也因此变为寻求认同,并强化自己与自己所认同的观点之间的关联。

(五)权威支配

如前述,群体极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别人所提供的信息或声誉方面的信号。但这些信息或信号并不会自动地驱策群体走向极端,可以说,权威支配乃是共同体行动的最重要环节之一。^[24]实际情况通常是,如果群体内部存在着森严有序的权威支配结构,那么,借助权威层发布的信号就会更为明确且具有支配力。因此,“如果一位权威要求你做某件显然有害或残酷的事情,你可能会完全照办,要么因为你认为应当这样做,要么因为你不想冒损害自己名誉的风险。”^[25]尤其是当权威上级拥有绝对控制权时,群体极化和极端主义的发生就往往更加无法避免了。因为这个时候人们更愿意强调自己是在照章办事,依此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罪责。真正的暴行,包括酷刑、种族屠杀、种族灭绝等,都可以参考这样一种机制而得到解释,而现实情境中发生的卢旺达大屠杀,也一再佐证了权威支配引致群体极化趋向更极端的诱发机制。^[26]

(六)境遇主义

前揭所有的解释,要给人类为什么长久以来会令人发指地造孽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仍旧稍有欠缺。上述机制能否真正推动群体极化的发生,能否引致极端主义的轨道上来,还取决于一种非常重要的要素:特定情境所带来的压力,只要环境适当,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许是几乎我们所有人,都可能会受到引导,以致犯下暴行。^[27]社会心理学和行为心理学的实验研究一再证明,个人的品格远比我们所预想的那样在极端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极为次要的作用,而具体境遇所制造的压力则往往更有可能导致行为端庄的人犯下可怕的暴行。在境遇构造中,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善恶之间的界限非常容易被渗透。具体情境所构造的空间则很容易缔造一个去个性化过程,在其中,作恶者和受害者都

[21] 同上注,第56-58页。

[22] [美]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梁永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二版。

[23] 桑斯坦:《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第68页。

[24] [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 III: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25] 桑斯坦:《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第84页。

[26] 想想卢旺达大屠杀的一名参与者的如下辩白:“当你接到一项新的命令时,你犹豫不决,最后还是服从了,否则你就冒一种风险。当你通过广播电台和官方的建议进行了适当的准备时,你就比较容易服从,即使命令你杀害你的邻居。一位出色的组织者的任务是在他对你发出指令的时候消除你的犹豫不决……你服从命令是毫无损失的。”因此,接下来的就是习以为常了:“起初杀人是强制性的,后来我们就习以为常。我们变得天然的残酷。我们不再需要鼓励或者罚款才会杀人,甚至不需要接受命令或建议。由于纪律不再是必要的,所以就松懈了。”同上注,第86页。

[27] 同上注,第87-88页。

变成了匿名者,都被具体情境安排成了一定的角色,在这种过程中,特定符号的变化都会使得群体行为选择发生重大变化。例如,一套制服的变化就会使得一个平和的人变得残暴无比。在去个性化的过程中,人们进入一种受刺激的状态。在其中,他们可以逃避普遍社会制裁,对自己的道德怀疑也可抱以沉默。^[28] 随着对这种境遇主义的运作逻辑的剖析的展开,也就不难理解为何那些号称为自由而战的美国大兵们,在阿布格莱布监狱中犯下如此可怖的暴行,甚至是女兵们也毫不例外。

当然,并非境遇主义就可以抹掉人的原初品格,也不是说人就完全屈从于外在环境的压力而无力抵抗。境遇主义对极端主义的塑造,进一步地取决于具体的激励因素,以及现有的信息。极端主义的发生需要有临界点的衔接。临界点和社会的互动往往会强化群体极化的产生并推动极端主义的发展。每个人引爆极端主义的临界点高低不同,这是信念问题,但如果在特定情境中被大量信息灌输,并且具体情境制造了足够的压力或者是给个人道德罪责提供了充分的开释机会,那么,人们就会借助具体境遇来行动。他们或者是被告知受其侵犯行为侵害的受害者是罪有应得的,或者是他们认为这是组织来承担的,他们只是在执行命令,或者是他们会发现,他们长期以来属于一个受尽屈辱、因此完全有理由对过去所受到的屈辱做出反应的群体,或者是他们发现某些受其侵害的个人或群体的思想倾向极其恶劣,甚至是不齿于人类,因此如此对待是没有任何问题的。^[29]

(七) 群体思维

群体极化还跟群体思维有着紧密关系。群体思维通常表征为思想保守,集体“寻找理由”,对可能会导致重新考虑的警告和信息加以贬低,以及对假想敌人的抱有成见的看法,或者简单地视为十分邪恶,因而不值得与之进行谈判,或者视其为十分虚弱且愚蠢,因而群体没有必要改变其风险很大的选择。群体思维往往会给组织及其成员构成巨大压力,使得其采用单一思维方式。在这个过程中,群体成员会自我审查,尽量贬低自己的怀疑和反驳的重要性。当然,群体思维推动群体极化向极端主义方向发展还需要借助如下几个条件才能成就:第一,群体内部的高度凝聚力;第二,做出决策的群体处于隔离状态,他们无法获得专家建议、也不会接受外部批评性评估;第三,内部缺乏公平公正的传统,领导层不愿意或者是抵触公开质询和批评性评估;第四,缺乏促进良好决策的程序机制;第五,群体成员的均质性背景和共同的意识形态。^[30]

三 从群体极化到极端主义的延伸

仅仅从社会心理学的层面来解释群体极化的形成机制,似乎有放大心理效应而忽视外围社会政治安排的嫌疑;仅仅建立研究模型来假设群体极化的产生,并不足以建立令人信服的理论论证。现实语境中存在着大量的群体极化的个案,它们的呈现方式有力地展现了群体极化是如何发展为极端主义的。

(一) 地理空间孤立与反对派运动

当今的社会政治运动往往来源于特定的地理空间,研究社会抗议运动的学者已经发现,

[28] 同上注,第93页。

[29] 同上注,第100-101页。

[30] 同上注,第111页。

有目的的歧视往往会催生具有特定标签符号、处在特定隔离机制所构筑的自由的空间,在这样的能够自主行动的空间,群体由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分离和隔离,他们更容易抱团而不是分裂,群体极化最有可能发生,最起码是在群体成员们基于这种排斥、分离、隔离以及特定符号而产生不满足或忧患意识的时候,情形更是如此。^[31] 这种地理空间的孤立催生反对派运动并最终导致反对派运动获得一定程度实现的情形,已经大面积地发生在种族、性别、年龄、宗教信仰和性取向领域。而与此相关的是,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基于特定标签建立隔离墙,一个群体成员就有可能分散在普罗大众中,他们就没有这个借助隔离机制而建立起来的“自主行动的地理空间”,也就没有机会进行只有群体成员才能进行的讨论,这样,受到极化现象刺激的反对派意识也就不会那么浓厚,他们构建反对派运动的可能性也就因此而急剧减少。

(二) 社会串联与 2008 年次贷危机

尽管哈耶克一再指出分离的知识结构对于市场的有效运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2]但分散在不同人手中的知识并非一定会最后达致哈耶克所孜孜以求的合作状态。原因出在人们并不总是在知识充分交流之后才做出决定,基于效率追求,也由于有限理性造成的短视,知识往往局限在小团体内的交流之后就做决定,结果就会造成严重的失误。在投资领域的研究已经发现了社会串联导致的大规模失利:绩效最差的投资俱乐部主要是社会性的,其成员密切关注彼此的意见。他们彼此相识,一起吃饭,并通过感情的纽带联系在一起。他们通常进行全体一致的表决,而不进行公开辩论。他们投票是为了增强社会凝聚力,而不是产生更高的回报率。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是绩效最佳的投资俱乐部,他们鲜有频繁的社会联系,关注更高的投资回报率,他们更愿意使用公开辩论的方式,允许不同意见得到充分阐述,最后是对不同意见的审慎定夺来做出投资决策,而不是简单的投票表决。^[33] 但在整个社会投资领域以及整个社会经济领域,社会串联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对于社会繁荣迷思的社会串联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传染病,它消除了一切关于经济可能衰退的信号,最后导致公众关于经济增长或持续繁荣的知识呈现升级或螺旋式上升。没有人会怀疑,没有人愿意怀疑,最终房产泡沫发生,推动了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全面爆发。而现在的情形是,关于房产价格下跌的社会串联效应已经开始形成并进一步发酵,在其中,具有理性的人越来越悲观,当他们看到别人纷纷抛售房产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如果这个社会串联进一步发酵,最终美国的房地产将会在长时段中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段位。^[34]

(三) 从“民族化”到民族运动

民族仇恨不是人类社会原生的,它并不存在于任何人的血液中。它们往往是一种迅速的、受到群体极化刺激的“民族化”的产物。民族化、民族骚乱以及民族敌对情绪的出现,都是因为受到了最近的社会压力的决定性的影响,而不是因为任何来自远古时代的东西使然。^[35] 具体来说,特定民族在特定地理空间和特定时间段的生存境遇对于其是否能够在民

[31] [美]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7-156 页。

[32] [英]F. A. 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121 页。

[33] 桑斯坦:《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第 130-131 页。

[34] 同上注,第 132 页。很不幸的是,桑斯坦正确地预见到了在房地产领域中美国的住房价格将长期维持在低位水平的现实状况。时至今日,美国住房市场不仅没有缓过劲来,相反,仍然在进一步的低迷。

[35] 同上注,第 133 页。

族化的方向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排犹主义在欧洲盛行了千年之久,但是犹太人更为认同犹太人的身份特征,更主要是因为希特勒在德国攫取权力之后犹太人自我保护的原因。民族化主要是出于对外在的针对特定种群的持续威胁所做出的具体反应。当一个民族或者宗教群体处境危险的时候,其成员更可能团结起来,强调使之团结一致的因素,或者努力实现同化。

当民族化的社会规范增加了相关压力的时候,就有必要从民族角度进行系统识别成员身份及其具体情境遭遇。广泛传播自己的民族特征可能是政治正确,当然,隐蔽自己的民族特征也有可能是政治正确。在一系列的语境构造中,存在着强大的压力要求群体从民族自身的角度进行自我识别,有时候因为要保住朋友,有时候是为了获得物质上的好处,有时候是为了挽救一个人的生命。不管最初出于什么原因,追求认同感往往能够给人们增加压力,在群体极化机制的联动催化下,迫使人们注重民族性,当民族化或者是民族认同发生时,群体极化以及某种形式的民族串联效应在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对此问题,南加州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提摩尔·库兰关于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民族仇恨的描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形象的阐释:

不出几个月,几百万过去不曾显示出民族狂热的塞族人开始关注民族统计数字,提倡塞族排外性的象征,诋毁和排斥非塞族人,频繁地提到自己的祖先所遭受的苦难,支持扩大塞族占领的领土……以前很幸福的各民族之间的通婚破裂了。以前无关紧要的历史事件突然之间变得对政治辩论来说具有核心重要性。^[36]

催生这种突然爆发的民族仇恨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原因是什么?核心点仍然是关于民族声誉的串联效应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民族认同感不是来源于对遥远过去的追忆,而是当前的或最近的社会压力所造就。即便是面临相对较小的冲击,过去没有沿着民族界限明显划分的异国人便仍然会走向民族仇恨、民族分裂和民族运动。

(四) 阴谋论

阴谋论是一种心理病态吗?如果不是,那么人们为什么会倾向于接受各种版本的阴谋论,并将其视为是对某个问题的唯一正确的答案呢?每当一起恶劣事件发生,流言和猜测都是不可避免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绝大多数人仅仅凭借个人或直接的了解是无法知晓一架飞机是怎样坠落的,一位领导人是怎样被暗杀的,或者是恐怖袭击何以得逞。在这些事件背后,总是会存在着很多种猜测,对不同猜测,人们的认同原因各不相同,但都有着相同的逻辑:某种义愤存在其间。义愤驱动人们去寻找证明自己情绪正当性的原因,从而把这些事件归咎于某种刻意的行动。阴谋论可能会缓解人们的强烈情绪,并提供了关于其个人情感的一种解释。

阴谋论之所以盛行,也与人们事先持有的信念有着紧密关系。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愿意接受与其自己事先抱有的信念相吻合的说法。在恶劣事件发生之后往往导致恶劣的社会影响,这些影响在阴谋论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大多数人并不是直接了解,或者是丝毫也不了解是什么造成了这起事件。当然,人们并不是自动接受阴谋论的,它还需要具体临界点,往往是相关临界点达到了之后,阴谋论才会被人们所接受。而达致阴谋论所需要的临界点,除了需要直接的间接的证据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串联尤其是信息串联在

[36] 桑斯坦:《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第137页。

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体来说,阴谋论这种有着明显认知缺陷的认知论之所以大行其道,不仅仅是因为群体成员的自我选择,而且也因为社会串联中的信息串联和声誉串联进一步强化了群体内成员的极化趋向。它会通过某种“双重思想”将自我隔离起来,保护自己的信念,使之免遭外来信念的挑战。^[37]其结果,群体极化并进一步加强,而且能够超越具体时空的限制。^[38]

(五) 道德义愤、社会影响与恐怖主义

如果一开始志趣相投的人们倾向于感到义愤,当他们聚集起来时,重大的转变就是情理中事。^[39]恐怖主义的发生就是这样一条社会串联的最佳注解。要认知恐怖主义缘何发生,就不能单纯地停留在一般所认为的仅仅是基于无知、贫困、教育缺乏、精神病变这样的想法上,而是要注意恐怖主义的本质及其由来。恐怖主义说到底就是一种社会抗议手段,它是缺乏公民权利与公民自由的人们由于被限制了合法的抗议手段之后所作的一种不得不的诉求渠道。^[40]推诸开来,当缺乏公民自由时,公民基本上只有一个信息来源,就是国家,而国家是不可信赖的。而如果该政权中的反对者或持不同意见者在被国家压制正常的信息传递渠道之后仍然能够成功地传递信息,那么他们说的话就要比政府更为可信,即便仅仅是因为官方来源无法在享有信誉机制的情况下对其加以驳斥。而普遍压制公民权利的国家,经常在道义上受到本国公民的普遍反对,它的可信度也因此大打折扣,这二者的结合,构成了恐怖主义在集权专制国家得以兴起的主要原因。

集权专制国家给其公民造成了有缺陷的认知论,由于缺乏充分的对话空间和对话机制,这些国家给那些倾向于暴力解决问题的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由于阻断了合法的政治抗议方式方法,他们倾向于认为只有暴力才能解决他们所期望解决的问题。

这种有缺陷的认知论加上严密的社会交往网络,使得恐怖主义得以进一步地发展壮大。有暴力倾向的人总能找到他们所想招募的人。又由于他们有着舌战优势,因此他们能够建立一个志趣相投者组成的小圈子,窒息不同意见,压制内部分歧,采取措施保证内部高度团结一致。他们限制相关论点的集思广益,充分利用声誉串联的力量,尤其擅长使用集体赞同或反对所带来的刺激。通过施加心理压力,强化道德义愤的吸引力,迫使集体朝向极端方向转变并加快转变进程。^[41]这种方式,在恐怖运动中俯拾皆是,纳粹集权主义也同样采用过。

(六) 小结:理性的极端主义

极端主义者和社会普罗大众分享这同样的认知缺陷:就人们以为自己所了解的绝大部分知识而言,他们都缺乏个人的或直接的信息;他们必须依靠别人的看法。但切不可因此就认为极端主义者是缺乏理性的。极端主义者通常不是精神病患者,他们是依据自己已经了解的情况思考和行事的。^[42]极端主义是群体极化的升级版,因此,可以肯定,极端主义是信息交流的产物。极端主义者,无论是其所信奉的思想观念还是其所采取的行动,都不是非理

[37] 同上注,第138-146页。

[38] 例如,肯尼迪刺杀案,时至今日,不仅在美国流传着种种阴谋论,而且,在中国这个远隔重洋的国家,人们仍旧对这件刺杀案中的可能阴谋保持着浓厚兴趣。

[39] 桑斯坦:《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第147页。

[40] 同上注,第148页。

[41] 同上注,第150页。

[42] 同上注,第156页。

性的产物,尽管它们来源于偏见,但是它们不属于情绪性反应,但是它们是在隔离机制和有限信息中做出理性反应,尽管这种理性是有限的。极端主义者与大多数人一样,都存在着“有限理性”和“有限意志力”^[43]的固有特点。因此,极端分子也会患上一般人所患上的毛病:不切实际的乐观症和易得性启发,^[44]仅凭现有情况就做出关于长远未来的判断,通常试图找到可能的最佳途径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极端主义者不管是处心积虑还是自发激情行动,都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贫困、未受过良好教育或者是患有精神病,或者是某种精神创伤的后遗症。严格来说,它们产生于社交网络和群体极化,是社会隔离机制发挥到极致之后的必然产物,是隔离机制背景中缺乏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的公民所表达的不得已的、经由理性选择了的抗议手段。如果不明白这一点,简化归因并在此基础上预防群体极化和极端主义,将只会强化它而不是有效预防它。

四 二阶多样性与极端主义的预防

群体极化并非天生有之,极端主义也不是某个群体的固有标签,它们均产生于后天社会制度构造,是社会隔离和制度规范缺失的产物,因此,防止(不具正当理由的)群体极化和极端主义,就必须关注群体极化和极端主义得以产生的基本诱因,关注它们所具有的社会政治效应,关注极端主义治理的非意图后果,而不是简单地把群体极化和极端主义视为有害的事物而采取彻底剪除的简化做法。

(一) 从一阶多样性到二阶多样性

群体极化是群体内的一种排斥异己现象,它建立在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心理、组织安排和制度隔离的基础之上,是这些机制安排的产物。但是,即便如此,并不排除群体内部存在着多样性产生的土壤,也并不意味着群体内部天生就与多种声音或意见毫无瓜葛。从人性本身来说,谦卑和好奇心是人固有的本性。桑斯坦在研究中早就已经发现,人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对自己在某一问题上看法或观念是否正确并没有把握,他们也因此会使得自己的意见变得尽可能温和。^[45]如果群体内部的成员们都对自己的意见保持节制并且如果支配他们的规范鼓励人们培养好奇心,允许他们接触他们所无法构想的信息、观念等,那么,在群体内部建构出依靠充分讨论、理性协商而不是单纯的集体投票来表决的社会结构之后,群体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交换的观念市场,不同形色的人物充斥其间并保持自由流动,极化就很难在其间形成,极端主义也就难以产生。

当然,一阶多样性的形成并不单纯地取决于内部社会规范,内部社会构造显得尤其重要。如果群体内有一个以上的成员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相信自己知道有关一个事实的正确答案,并且它不是依靠压制或者是声誉串联或者是信息串联的方式,而是借助“意外发现的架构”这样一种方式来讨论相关问题,给自由充分讨论、审慎定夺的空间,那么,群体就不大可能走极端。^[46]但是,知情成员并不一定愿意进行充分自由讨论,他们更愿意以确信不疑

[43] [美]克里斯丁·杰罗斯、凯斯·R.桑斯坦、理查德·H.塞勒:《行为法律经济学的进路》,载[美]凯斯·R.桑斯坦主编:《行为法律经济学》,涂永前、成凡、康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8页。

[44] 桑斯坦:《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第159页。

[45] 同上注,第52页。

[46] 同上注,第58页。

和权威的口味发布信息。^[47] 因此,如果群体内存在着两个方向以上的相关信息,并且这些信息所涉及人群数量大体相当,都有着知情成员,那么,内部一阶多样性的发生就会不可避免。当然,这取决于群体内部的组织安排和制度构造:“如果讨论前在某一方向上存在明确的趋势,而且人们的思路得到充分开通,因而很可能会听取彼此的意见,标准的极化就会发生。而如果群体成员人数分配十分平均,而且人们愿意听取他人意见,去极化就会发生。如果当某人宣布事情的真相时大家都知道这就是真相,大家就会殊途同归。如果人们了解自己的观点而且认为持有异议的人们不是恶棍就是傻子,他们的观点就不会发生任何转变。”^[48]

上述结论不仅适用于群体内的一阶多样性,对于群体之间的观点、意见、信念、信息的多样性这样一种要求,二阶多样性也同样适用。毕竟,要求一个群体内保持多样化,防止群体内出现“回音室”,这种要求过于苛刻。因此,关键点并不是不应该存在一个极化了的群体或组织,问题毋宁是一个社会是否允许多元组织的存在并支持观点、意见、信念和信息的多样化。如果多样极化了的组织可以被允许存在于同一个社会之中,并且它们之间不存在社会建立的隔离墙,那么,即使每个组织都是由志趣相投的人组成,并且每个组织都只信奉它所信奉的观念,整个社会或者是国家仍旧会最终受益于这种分散化、多样化了的群体极化,因为每个组织的观点都表征着其独有的见解,而这些见解又可以通过平等对话和理性讨论的方式进行阐述和妥协,最终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出现了范围广泛的观点和做法,它们的极端主义最终导致了社会产生“观点的蓄水池”并使其丰富起来,从而促使理性的解决方案的形成。^[49]

在一阶多样性和二阶多样性之间,存在着一个共同之处:如果志趣相投的人们与其他同样如此的人进行交流,他们的活力就比较可能会被激发起来。而如果他们被激发了活力,那么他们就可能变得很活跃,在政治上或其他方面也都是如此。如果人们听取到对方的意见,认真考虑相反的论点,它们就很可能怀着尊重的容忍的态度,但他们也可能比较消极,甚至也许漠不关心。群体极化促进了人们的参与;与若干其他人交谈可能会造成不采取行动和瘫痪状态。一个政治进程很可能依赖于这样一种情况:由志趣相投的人们组成的许多团体组织纷纷激励其成员谋求变革。^[50] 这种一阶多样性和二阶多样性的结合,已经在社会政治领域引发了巨大的社会政治变迁,种族平等、男女平等、同性恋的合法化、公民固有权利保护的扩张、社会福利权利的扩张、民族解放运动等背后,无不渗透着群体极化的影子,无不体现出二阶多样性所构造出来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制度功效。

(二) 二阶多样性与防止极端主义的制度安排

依从二阶多样性的基本逻辑,防止极端主义的制度安排必须从确保观点多样性入手,依赖言论自由、制约与平衡的制度来消解极端主义的弊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仰赖传统主义来防止极端主义是不可行的,尽管按照传统主义的逻辑,“如果群体成员尊重过去的做法,它们就不大可能会将其抛弃,转而选择内部讨论所产生的结果。”尽管“尊重传统的人们发生极化的可能性极小”。但是,“传统之所以可能会持续存在,不是因为它们是好的,而是因

[47] 同上注,第59页。

[48] 同上注,第63页。

[49] 同上注,第192页。

[50] 同上注,第193页。

为业已造成群体极化的种种社会影响。毕竟,传统传递消息,人们之所以遵守它们,不是因为他们在独立思考的情况下相信传统是好的,而是因为别人(看来)相信它们是好的。”进一步地,即使“人们可能知道传统是坏的,因而不信任过去的判断,但却仍然可能会因为声誉方面的压力而遵守过去的做法”。^[51] 对此问题,霍姆斯大法官也曾言及:“伟大的案件之所以被称为伟大,并不是因为它们塑造未来法律时的实际重要意义,而是因为诉诸情感并歪曲判断的当前压倒一切的利益的突然发生。”^[52]

如果说传统主义最后会陷入到群体极化的泥淖中,那么,后果主义又如何呢?“后果主义的希望是,必要的调查能够通过要求人们与事实接触,减轻社会争端以及与群体极化相关的风险。”^[53] 但后果主义由于强调后果体验对于约束群体极化的重要性,因此,围绕后果问题的争论通常反映出群体极化而不是减轻群体极化。对后果的结论性看法的不同会使得持有不同立场的人们固化其原有看法,而不是修改其原有看法,尤其是在后果体验往往是分属于不同志趣相投的组织的成员借助其原有偏见并在介入点方面有意识地加以选择和塑造的时候,更是如此。^[54]

群体极化意味着意见的高度一致,它拒斥多样性、分歧和意见的不断交锋,它总是追求千篇一律,也正因此,它追求的是志趣相投的人们在与他人完全隔离的情况下在自己的小圈子内进行讨论,而这最后的结果就是普遍的失误乃至灾难性后果。要防止这种结果出现,制约与平衡的制度安排就显得尤其重要。制约与平衡是一套涉及面非常广泛的制度安排,就国家核心权力架构而言,它重点防止权力过于集中,防止政府机关沦为狂热情绪的可怜的受害者,不管这个机构是国会两院,还是总统府,还是最高法院,也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它要求这些机构内部以扩张一阶多样性为主要建制方式,同时要求不同机构之间建立以二阶多样性为核心的关系架构:可以系统阐述自己的部门之见,但需要制度疏通渠道来吸纳别种声音,关注另种利益表达机制。不仅如此,为防止政府内外存在着毫无理由的极端主义,需要建立用相反声音来加以抗衡的制度安排,当一些人受到诱惑,受到压力而采取极端立场的时候,可以与之抗衡的是另一些人,他们通过观念市场的自由交锋,可以指出前者的事实和价值观的错误,指出前者所遗漏了的重要事实,它建立鼓励相互倾听的制度空间,确保没有机会听到不同意见的人在作出决定之前都有机会在不承受压力、支配的情况下,充分听取不同意见。在这种制度安排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让不同意见在它们都具有对其无知听众形成有效社会影响之前,形成辩驳的先后顺序。

总体来说,如果社会政治治理的目标是要消除群体极化以及极端主义的有害影响,那么,关键之处就在于保证持有某种自信满满的人们接触到可信的相反论点,而不是让他们持续地生活在自己设计以及治理机制所强加的“回音室”中。走极端并非不可取,但前提在

[51] 同上注,第 165-166 页。

[52] [美]霍姆斯:《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霍姆斯法学文集》,明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92 页。

[53] 桑斯坦:《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第 169 页。

[54] 同上注,第 172 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也指出后果主义所依赖的三个条件:“情景化的评价;最大化的框架;状态成分的非排斥性”。而这三者又往往受制于三个附加假设条件:“(1)坚持所有事态的完备排序;(2)把行为、动机、过程和事态的其他特征从一种被认为地剥夺的事态概念中撤除;以及(3)忽视行动者相对于行动和导致的事态的位置性。”因此,后果主义在忽略了后果体验和后果评价所需要的支撑体系之后,往往最后简化为先前偏见的强势塑造。参见[印]阿马蒂亚·森著,应奇编:《后果评价与实践理性》,东方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05-428 页。

于极端并非终极目的,而是为了形成范围更为广泛的信息、观点、立场,让这些信息、观点、立场更为可信,而不是给予某种社会串联而自我封闭。防止极端主义危害性的中心存在于二阶多样性之中,因此,如果极端真的发生,那么,它应该建立在经由制约与平衡机制充分证明了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基础之上,而不是因为观点相同的人们之间的基于社会串联效应而形成的互动所造成的。

五 结语:群体极化机制的启迪

桑斯坦关于群体极化现象的描述,意在向我们解释隐藏在群体极化和极端主义背后的社会心理学机制、组织反映机制以及制度安排机制是如何导致群体极化现象的进一步加剧以及其灾难性的后果之所以得以形成和产生的。这种方法进路所揭示的问题关切,给了我们在认知当代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政治治理的几点启迪:

(一)公民权利与公民自由的赋予与权重

群体极化并非社会大众毫无理性的情绪性反应,而是社会大众在权利和自由不能充分自由行使的时候一种自我确信和自我授权。以恐怖主义为例,绝大多数的恐怖分子都发端于缺乏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的极权专制国家。在这里,恐怖主义尽管是一种暴力活动,但是它们仅仅是在具体层面上可以做如此解释,就抽象意义而言,它并非一种暴力活动,而是一种政治抗议,是社会大众或者是处在社会弱势边缘的少数人在缺乏表达自己抗议意见的一般机会的情况下的自我救济机制。^[55] 消除恐怖主义,消除潜藏在这个世界各个角落中的不起眼的极端主义,最重要的解决办法就是赋予这些处于边缘状态的人以其所应享有的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让他们获得如德沃金所要求的那种在“设计和实施统治他们的政治制度的时候”,给予这些边缘个人或群体以“平等的关切与尊重”。^[56] 不仅如此,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的充分享有以及获得平等对待,对于消除群体极化和极端主义的弊端,维系社会政治的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个人享有充分权利和自由,民主国家才有更好的机会获得准确的信息,使它们能够纠正错误的行动方针。^[57] 由此可以进一步引申的是:如果制度能够迫使领导人接受批评与严格审查,能够确保行动方针受到外界人士的持续监督与审议,其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二)社会隔离机制的解除

“社会隔离是群体极化的一项有用的工具”。^[58] 社会隔离使得群体之间呈现出“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孤立状态。问题不仅如此,关键点在于这种孤立状态培养了自以为是、怀疑他者、扭曲他人信息的可信度、排斥异己,最后催生极端主义,它已经被证明是当代世界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因此,“对于法律和政策来说最为重要的教训是,如果一个国家的目标是阻止恐怖活动,一项出色的策略就是避免志趣相投的人们所组成的小团体的出现。”^[59] 要防止志趣相投的小团体出现,不是简单地宣布这些小团体

[55] 桑斯坦:《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第 148 页。

[56] [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年版,第 242 页。

[57] 桑斯坦:《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第 185 页。

[58] 同上注,第 5 页。

[59] 同上注,第 155 页。

为非法或者是取缔它们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对于一个意欲形成稳定和包容的政治治理的政府来说,最大的危险不是来源于多元群体的存在和多种声音的存在,而是建立一种完全或近乎完全的自我隔离,这种隔离最后会导致极端主义者和边缘弱势群体的不幸且致命的结合。因此,消除社会隔离机制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不是消除讨论空间,而是为小圈子内的讨论活动创造空间,而又不使小圈子成员与持有相反观点的人们相隔绝,也不使小圈子外部的人们与小圈子内部的成员的观点相隔绝。关键点在于拆除社会隔离机制,促进群体内的多样性、分歧和意见的不断交锋,消除铭刻在不同群体身上的识别符号和歧视性标签,促进多元群体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理解。^[60]

(三)更自由的信息流动、更充分的对话

尽管群体极化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是信息串联,但不要误解为是自由信息流动导致了群体极化并最后引发极端主义的产生。桑斯坦不止一次地指出,群体极化以及极端主义是一种有缺陷的认知论,是在信息不能自由流动、无法进行自由对话的境遇中产生的。更自由的信息流动满足了人的好奇心,有效地抑制了人同时存在的“价值同嗜”倾向;更充分的对话引发适度的社会震荡,“它防止政府退化,为对公共事务的普遍关注提供营养。”^[61]而黑格尔当年为法国大革命所做的一个注解也充分说明了更自由的信息流动和更充分的对话对于治理社会危机的重要性所在:“在法国,一直显得言论自由要比默不作声危险性小得多,因为后面一种情形,怕的是人们会把对事物的反对意见扼在心头,至于争论则可使他们有一个出口,而得到一方面的满足,何况它又可使事物更容易沿着本身的道路向前推进。”^[62]

(四)公共论坛的建构

信息的自由流动和对话的充分展开,不仅仅意味着国家不能任意干预,而且还意味着国家必须建构足够的面向社会大众开放的公共论坛,以便进行意见表达和充分阐明的活动。公共论坛作为一种维系“意外发现的体系结构”,“确保了发表言论的人有机会接触到在其它情况下可能生活在自己小圈子内的形形色色的人们”,它“允许发言者有机会不仅普遍接触到不同的人,而且还接触到作为他们不满的对象以及在其它情况下有可能无法了解到这种不满的具体的人和具体的机构”,最为重要的是,它还使得人们“接触到范围广泛的各种人和各种观点”的“可能性增加”。^[63]总体来说,公共论坛作为一种意外发现的体系结构,它是一个运转良好的制约与平衡机制的一部分;它有助于遏制“回音室”效应,确保戴着有色眼镜的人们,或者宁愿在信息方面与世隔绝的人们也偶尔了解到其它地方的情况,保证人们所看到的情况或许有可能改变他们的想法,甚至是他们的生活。

(五)开放的技术架构

社会大众并不单纯地依赖口耳相传或者是信息销售额来建构知识,传媒在推动大众知识的过程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作用。^[64]日报、新闻周刊、广播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传播

[60] 我国有学者已经开始运用此视点来分析中国当代民族结构性治理困境,并得出了较诸常规分析结论截然不同的结论,对于认知时下中国政治治理模式或许不无启发意义。参见汪晖:《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载于汪晖:《亚洲视野:中国历史的叙述》,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9页以下;郑戈:《文化、发展与民族区域自治:中国宪法语境中的西藏问题》,载《洪范评论:宪政与发展》(第12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89页以下。

[61] 引语出自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桑斯坦:《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第196页。

[62]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34页。

[63] 桑斯坦:《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第198-200页。

[64] 同上注,第119页。

媒体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群体极化还是消除群体极化,保证整个社会的理性思维,往往取决于整个政治治理对待这些技术的支配性架构。从社会串联的角度来看,开放的技术架构将有助于消除社会串联的两种表现形式:信息串联和声誉串联。而恐怖主义在当代的最新发展机制也一再证明,如果封闭传播媒介的技术架构,那么,即使没有所谓的传统权威或者是魅力型领袖,封闭语境中的互联网仍然会催生网络恐怖主义,而且,面对着这种去中心化或中心空洞化的恐怖主义产生机制,所需要采取的控制措施的成本将会高不可攀,并且会催生更新的恐怖主义以及其它种类的极端主义。^[65] 而在日常政治领域,封闭传媒技术架构,最后多半引致的是公信力的透支与严重的群体极化和极端主义的蔓延,这个事实近些年已经在多个领域中一再得以证实了。因此,引入开放的技术架构,确保传播媒介在防止极端主义产生并扩张以及治理社会政治危机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当政者所不可不予以时刻警醒的警钟。

[**Abstract**] Group Polarization, created through separation of members from the rest of society and self-belief and self-acknowledgement, is a social phenomenon. It means that after group discussions, like-minded people tend to maintain their original views and become more extreme than they were before. The very cause of social psychology that has led to group polarization lies in the exchange of new information, and other factors including sense of reputation, dominant position in debates, biased arguments, secession mechanism, social pressure, power structure, concrete circumstances and group thinking have further intensified trend of group polarization. As like-minded people can be found in both social and political spheres, they do not act rashly, rather, they act on the basis of rational self-choi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induced by social isolation mechanism. Taking this fact into account, prevention of group polarization cannot rely on an oversimplified and rude method. Instead,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establish a set of effectiv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diversity of thought within a group and among groups. An open space for social debates and fre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should be encouraged and supported, thus forming an effective system of check and balance.

(责任编辑:黄 列)

[65] 同上注,第 102-106 页。